

【珞珈语言文学学术丛书】

汉语音义学论稿



万献初◎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万献初◎著



汉语音义学论稿



【珞珈语言文学学术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音义学论稿 / 万献初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161 - 0904 - 5

I. ①汉… II. ①万… III. ①汉语—语音—研究
②汉语—语义—研究 IV. ①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835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徐楠
责任印制 张汉林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70 千字
定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珞珈语言文学学术丛书

主任：赵世举 刘礼堂

副主任：尚永亮 陈国恩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献初 王兆鹏 吴天明 张 洁

张荣翼 陈文新 於可训 涂险峰

目 录

一 汉语音义学导论

- 音义文献与汉语音义学研究 (3)

二 《汉书》音义研究

- 萧该《汉书音义》音切考辨 (23)
- 颜师古《汉书注》音义研究综论 (41)
- 颜师古《汉书注》音切数据与术语考析 (64)

三 《经典释文》音义研究

- 《经典释文》“如字”与音变构词 (87)
- 《经典释文》音切类目研究的基本结论 (121)
- 赵少咸《经典释文法氏校语录》批校之音读考辨 (149)

四 唐宋音义研究主题

- 《可洪音义》音切的内容、性质及其作用 (179)
- 《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互注”异音考析 (200)

五 元明清音义研究主题

- 《经史动静字音》别义异读的音义考辨 (225)
- 明清“问奇”著作中的音变构词 (251)



六 音义学理论探索

| | |
|-------------------------------|-------|
| “真值注音音切”与“假性注音音切” | (289) |
| “二音、三音”与“二反、三反” | (310) |
| “因音辨义”与“以义正音” | |
| ——从“贲”的音切聚合看《古音汇纂》的音义研究价值 ... | (322) |
| 传统语言学的材料基础研究在 21 世纪中国语言学 | |
| 中的地位 | (342) |
| 后 记 | (350) |

—

汉语音义学导论

音义文献与汉语音义学研究

何为“音义”？一般说来，注释读音的书叫“音”，解释语义的书叫“义”，合起来叫“音义”。古代汉字以音寄义，音切与训诂互为表里，标注、考辨字音主要是为了辨析字义，以便读通经文及其注文。“音义”或称“释文”，“释文”即解释文献语言的音和义，“音义”即注音以释义，则“音义”和“释文”都是音义书。我国古代的音义文献非常丰富，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类，也就构成了汉语音义之学的文献基础。

湖北省图书馆的古籍目录版本学家阳海清先生主持编成的《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一书，2002年10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王皓为责任编辑。全书分五类，收各种“小学”著作4813种12067部：小学“总类”124部；“文字”类4881部；“音韵”类3022部；“训诂”类2929部；“音义”类1111部。传统小学书目一般都只分“文字、音韵、训诂”三类，该书目增置“音义”一类，实属新举措，受到汉语研究者的关注。音义书是否该列为小学书目的一个独立门类，关系到汉语音义之学的建设和定位问题，值得展开来讨论。

传统所谓“小学”，就是今人所说的“语言文字学”。章太炎始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中为“语言文字学”正名并定义，使传统小学真正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成为独立的汉语言文字学：“所谓小学，其义云何？曰字之形体、声音、训诂而矣”，但它不只是教识字、解经文的旧小学，“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它“非专为通经之学，而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因为“一切言语皆有其根”，所以语言文字学除了识字通经之外，更主要是通过字形、读音、意义的研究去“求语言文字之本原”。^①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谓“周礼八岁入小学”，则早有“小学”之名。《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八体六技，《苍颉》一篇，《凡将》一篇，《急就》一篇，《元尚》一篇，《训纂》一篇，《别字》十三篇，《苍颉传》一篇，扬雄《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诂》一篇。凡小学十家，四十五篇。”则“小学”已指传统语言文字学，所录小学书目，皆为文字训诂之类。隋唐以后，小学渐分为文字、音韵、训诂三类，至清《四库全书总目·小学类》“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小学三分遂成定式。故黄侃总结说：“今之所谓小学者，则中国文字、声韵、训诂之学也……即于中国语言文字中研究其正当明确之解释，借以推求其正当明确之由来，因而得其正当明

^① 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1906年第24、25期。

确之用法者也。”^①

前人以及当今的丛书、书目绝大多数同《四库全书》，在经部下设小学类，再分文字、音韵、训诂三个子目，以《说文解字》为代表的字书归文字类，以《尔雅》为代表的训诂纂集之书归训诂类（也有把《尔雅》独立为经部一类的），以《切韵》（实即《广韵》）为代表的韵书归音韵类，而以产生于《切韵》时代的《经典释文》为代表的音义书则不列入小学类中，往往被视为经传注疏的一个分支。音义书一般的归类方法是：单书的音义随其书归类，众书的音义则归在各部（多为经部）的“总义”类下。实际上是不把“音义”书归为一个独立的类，而散在各部各类之中，如《礼记音》归“经部·礼记类”，《经典释文》归“经部·群经总义类”，《汉书音义》归“史部·正史类”，《一切经音义》归“子部·释家类”，《文选音义》归“集部·总集类”，等等。也有在“经部·群经总义”类之下设“音义”子目的（如《中国丛书综录》），但只收那些兼跨多经的音义书，不收单经音义，更不收其他部的音义，故这种“音义”不是完整而独立的音义书目类别。

然而，将音义书与小学类书并列之举古已有之，如《隋书·经籍志》云：“魏世又有八分书，其字义训读，有《史籀篇》、《苍颉篇》、《三苍》、《埤苍》等篇章，训诂、《说文》、《字林》、音义、声韵、体式诸书”，其中《说文》、《字林》与前列四“篇章”是以专门字书为类，余下四门是：文字（体式）、音韵（声韵）、训诂、音义，可见是明确地将音义书列为小学中的一类而与文字、声韵、训诂平列了，也就是认为“音义”不同于传注笺疏，而更近于语言文字之学。因此，音义书

^①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是否该集中为独立的一类，是否该归属语言文字学（即传统小学），就要进一步讨论“音义”的性质。

—

“音义”的主要特征是注音、辨音，故又称“音、音证、音训、音解、音隐、音义隐”等，其中的“音”往往是训解、证明、阐发意义的手段，音义书是通过注音、辨音来释义的，它是传注的发展，但又不同于一般的传注笺疏。

周祖谟给音义书定义云：“音义书专指解释字的读音和意义的书。古人为通读某一部书而摘举其中的单词而注出其读音和字义，这是中国古书特有的一种体例……这种书在传统‘小学’著作中独成一类，与字书、韵书、训诂书体例不同，所以一般称为‘音义书’，或称‘音书’。”^①清人谢启昆在其《小学考》中用六卷的篇幅专门考“音义”之书，共收音义书目268种，考定尚存者43种，余则标明“佚”或“未见”，他在卷四十五论及音义书的特点时云：“音义为解释群经及子史之书，故诸家著录不收入小学。然其训诂、反切，小学之精义具在于是，实可与专门著述互订得失，且《通俗文》、《声类》之属，世无传本者，散见于各书音义中至多。则音义者，小学之支流也。昔贤通小学以作音义，后世即音义以证小学，好古者必有取焉。”都是说音义书的性质特点更近于小学，应属传统小学中的一类或一支。

我们认为，音义具有兼跨经学、小学众多门类的特点，包含

^① 周祖谟：《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452页。

着多元的语言因素。首先，音义与传注（包括笺疏）不同。传注是通过解释词语来疏通经（注）文的意义，以释义为主，注释的着眼点是词义和文意。音义则以注音为主，注音又以辨析字音为多，主要是“因音辨义”或“以义正音”，此外才辅之以训释词义、校勘异文、辨明句读、疏通文理，虽然注音的目的是为了明义，但音义的着眼点和辨注对象主要是读音。因此，传注是文意解释型的，音义是音读辨析型的；传注主要是语文学的，音义主要是语言学的；传注多是经学的内容，而音义主要是小学的内容。

在小学范畴内，音义与文字学的析形求义完全不同，无须多言。音义只在释义通经的总目的上与训诂相同，在具体的注释对象和方法上与训诂又不相同：散在传注中的随文释义的训诂是直接释义的，很少注音；训诂纂集（如《尔雅》等）是把散在传注中的词义训释汇编起来，也很少注音，而音义以注音、辨音为主，因音辨义，音明然后义自明，其注释、辨析的对象主要是音读。音义与音韵（韵书、韵图）都是辨析、研究语音的，但韵书主要反映某时、某地、某语音系统的特点和面貌，不注重语音所负载的意义；音义书则主要通过注音、析音来辨明经注文句中被注字的意义，注音是释义的手段，正如唐顾齐之所谓：“文字之有音义，犹迷方而得路，慧灯而破闇，……得其音则义通，义通则理圆，理圆则文无滞，文无滞则千经万论如指诸掌而已矣。”^①

我们以陆法言《切韵》作为韵书的代表，以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作为音义书的代表，可以比较出二者不同的性质特点：

（1）韵书要给当时整个社会使用的各类文字注音，常用字

^① 顾齐之：《新收一切经音义序》，《正统一切经音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更要遍注音切，要建立规范性的读音系统；音义书只为限定的经注文本中需要辨音明义的字头注音，如《经典释文》中“二、门、雪、人、我、多、公、受、买”等音义易晓又无别义异读的常见字就不出注。

(2) 韵书注音是为了确定被注字的音韵地位，无异读的字头只注一次切语；音义书则是随文注音辨义，需要注音的同一字头在不同处出现就得重复施注，以至同一字头注同形同音切语高达千次。

(3) 韵书是可供查检的辞书，音注体例体现音系的特点，以四声为纲，按韵目排列，利于查检字的音韵地位；音义书是为读经者辨音明义的，依经注顺序随文摘字为音，按需施注，故不是每个字都能从中找到音韵地位的，它并不着意建立语音系统。

(4) 韵书“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建立的读书音系大体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有较强的规范性；音义书面对经典文献，释义通经是注音的目的，不同时、地的读法今人不能理解，故要保存经师异读、假借破读和古旧方俗之音，方能遍通经注，其语音层面复杂。

(5) 韵书要准确注音，一般只用反切注音法；音义书要与传注配合来疏通经注的音义，需要标注字音、辨析音变构词、明假借、析字形乃至辨协韵，单用一种注音方法是不够的，故《经典释文》等音义书在反切大行之后还要用“音”、“如字”、“某某之某”、“读”、“协韵”等多种注音方法来分别体现被注字在形、音、义上多种多样的差异和相互关系。

音义书标注、辨析的主要对象是音，注音是为了明义，这就形成了“音义”的多元性特征，正如沈兼士所言“注音之字，

往往示义，而释义之文，亦往往示音”^①，因音辨义，音义并重，所以才叫“音义书”。正因为音义书“音”近音韵而“义”涉训诂，才使它类属难定，游离乎经学、小学之际，徘徊于音韵、训诂之间。如方孝岳就认为以《经典释文》为代表的“书音”（即音义）应属于训诂学中的一个门类：“书音者训诂学，韵书者音韵学。韵书所以备日常语言之用，书音则临文诵读，各有专门。师说不同，则音读随之而异。往往字形为此而音读为彼，其中有关古今对应或假借异文、经师读破，等等，就字论音有非当时一般习惯所具有者，皆韵书所不收也。所谓汉师音读不见韵书者多，往往即为此种，而此种实皆训诂之资料。”^② 我们说，恰是因为音义书有不同于传注、音韵、训诂的独特性质，才使它在汉语研究中具有独到的价值和意义，所以要在语言文字学文献中增置“音义”为独立的一类。

三

王力《汉语史稿》把汉语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汉初（公元前三世纪）到东晋末（五世纪），是语义研究的阶段；第二阶段从南北朝初（五世纪）到明末（十七世纪），是语音研究的阶段；第三阶段从清初（十七世纪）到现在，是全面发展的阶段。”^③

① 沈兼仕：《吴著经籍旧音发墨》，《经籍旧音序录、经籍旧音辨正》，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4页。

② 方孝岳：《论经典释文的音切和版本》，《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③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页。

汉语研究从第一阶段以《毛诗诂训传》、《尔雅》为代表的语义训诂重点转移到第二阶段音（义）书、韵书大行的“音韵锋出”的语音研究重点，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第一，魏晋以后，汉语的语音系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周秦古音向隋唐今音的重大转变；第二，随着社会和思维的快速发展，需表达的词义快速增长，周秦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的词汇系统已经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词义表达的需求，而双音词产生的高峰期尚未到来，为缓解词形（汉字）数量不足与词义表达需求过大的矛盾，变音别义、音变构词就一度形成大势，巨量的音变、音借现象积淀在典籍及其传注之中，以至于不分析音读就不能明确词义和文意，于是音义书就应运而生；第三，六朝骈俪文风促进了诗律学的发展，追求韵律、节奏之美，就需要准确地分析和把握汉语的语音体系和语音结构，当时的学者从大量的佛经翻译中认识了印度的语音学（声明），转而用于汉语的语音研究，于是反切很快成为主导的注音方法，声调得到认识并用于分析诗歌创作中的“四声八病”，韵部的系统分析和归纳就形成了韵书。

韵书的主要任务是标明汉字的音韵地位，建立规范性的读音系统。而音义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前代文献语言的读音所涉及的语义问题。如上所述，汉字数量的增长总是赶不上汉语词义表达的需求，音义与字形不断磨合、冲突，再磨合、再冲突，经典传注中的这类冲突累积传递到六朝前后，矛盾已经达到高峰，一字形兼表多音多义，负担越来越重，不定音则不能定义，故需要用注音辨音的方式来确定语境中的词义，因此音义书所注音切中明假借的破读就多，辨析音变构词的异读就更多，只有词汇双音化才是解决这种矛盾的必然办法，但当时还处在汉语词汇以单音词为主的年代，因音辨义仍然是其时缓解音义与字形矛盾的最有效手段。也就是说，音义书的产生与兴盛是汉语发展史上的必然，